

紅旗周報

1932年3月——5月

3

影 印 者 说 明

《红旗周报》，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一九三一年三月九日创刊，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终刊。共出六十四期，另有附刊十三期。

为便于使用和保管，《红旗周报》影印本（内缺第五期）分六册合订，附刊十三期放在第六分册末。

红旗周报 （第三分册）

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1982年影印 本册定价：8.00元

（内部发行）

光明之路

報 週

第
三
十
一
期

版 出 日 十 月 三 年 二 三 九 一

紅旗週報 三十一期

一九三二年
三月十一日

目 錄

革命的民族戰爭怎樣才能夠勝利？

規範口號的藝術

談談工廠小報和羣衆報紙

一九三一年職工運動的總結

從馬占山到蔡廷楷

蓬蓬勃勃的中國蘇維埃運動

一、湘贛蘇區省委報告

二、湘贛蘇區土地和商業累進稅暫行征收條例

革命的民族戰爭怎麼樣才能夠勝利？

中國的革命兵士羣衆在上海和日本帝國主義打仗，已經打了一個多月了。中國的軍隊每天都打勝仗。這難道是國民黨軍閥指導得好？不錯，國民黨軍閥蔡廷楷蔣光鼐等，到如今還霸占着上海軍隊的指揮機關。但是，他們並不想打勝仗，他們而且存心要打敗仗，國民黨在這次對日戰爭裏面抱定了一個失敗主義的宗旨。事實上的證據多得很：

第一，國民黨軍閥禁止兵士羣衆衝過租界去消滅日本的軍事根據地。他們已經屢次下令命令叫衝過租界的兵隊退回來。因此，打了一個月的勝仗，永久是個『我軍保持原有陣線』。

第二，國民黨軍閥是故意保存敵軍的根據地，是故意讓敵軍天天可以從密布鐵絲網來打中國的兵士，來轟炸中國的勞動民衆。他們故意讓日本的援軍可以安安全穩的一批一批在租界登岸，來打敗中國的兵隊。

第三，國民黨軍閥屢次接受英國等的所謂調停的條件。第一次是一月三十一日到二月二日的三天休戰，他們當時表示同意於設立上海中立區，請國際帝國主義來共管。這三天中間，他們是讓日本的海軍陸戰隊整理好了隊伍再來進攻。第二次是他們接受法國

總領事的提議，說是休戰半天，以便救濟難民。而事實上難民只救濟出幾百人，而那天正是大批的日本陸軍趁此安全的上岸。第三次是最近二月底他們又接受英國的調停，表示同意於華軍撤退十里而停戰的條件。每次的妥協表示，都是故意讓日本軍隊整理，補充，安排陣線，再來進攻。這樣，一直到打敗中國為止！

第四，國民黨軍閥唯恐怕日本軍隊打敗，唯恐怕自己的兵士羣衆不打敗，不死完，所以，事實上完全禁止民衆義勇軍去幫助兵士作戰，而且天天解散義勇軍，逮捕組織義勇軍的工人和革命學生，吞沒民衆捐助給兵士的捐款物品。甚至於像胡漢民等類的要人居然公開的出來主張命令解散全國一切義勇軍。

第五，國民黨軍閥尤其注意的是所謂勦滅『共匪』——紅軍。他們是唯恐怕中國勞動民衆自己的軍隊——紅軍打到上海，武漢，滿洲……，直接去驅逐日本軍隊，驅逐一切帝國主義的力量。

國民黨軍閥現在存心要打敗的指揮着上海的反日戰爭。既然打仗，又存心要打敗仗，這不是奇怪之至嗎？一點也沒有什麼奇怪！

國民黨的國民政府原本是絕對不要打仗的，他早就叫上海市政府接受日本的一切條件，答應完全禁止抗日運動。國民黨軍閥蔡廷楷蔣光鼐等也是不要打日本的，只因為胡漢民孫科和汪精衛蔣介石爭奪中央政權，只因為他們自己怕願祝同的蔣派軍隊來奪他們

上海的地盤，所以才假裝着抗日。上海的戰爭原本無兵士羣衆不肯接受退却的命令而發動起來的，原本是勞苦民衆的熱烈的反帝國主義鬥爭發動起來的。等到戰爭成了已經事實，汪精衛蔣介石方才說什麼『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胡漢民孫科，方才主張什麼『收復失地，全國抵抗』；蔣光鼐蔡廷鍇方才勉強指揮作戰，說什麼：『日本一日不罷兵，……中國即抵抗一日』。

國民黨的詭計是：上海戰事既然已經爆發，就借此利用兵士和民衆的性命，自己出來冒名頂替的騙得一個『愛國英雄』的名頭，好來欺騙革命的兵士，維持住自己對於這些兵士的指揮權，而同時利用這種指揮權而實行狡猾的祕密的失敗主義的陰謀。國民黨的打算，是想用這種種計策，弄到了一個失敗的局面，然後出來說：——並非我們不抵抗，而是抵抗失敗了，現在只好『暫時』忍痛妥協，禁止抗日反帝運動，從此『臥薪嘗胆，靜悄悄準備報仇罷』。這樣，他們的賣國計劃便可以更進一步實行了！

所以，反日戰爭的軍隊的指揮權還在國民黨手裏的時候，這個戰爭的真正勝利是絕對不可能的。而且一定要失敗的。現在上海每天打的勝仗，不是國民黨軍閥的功勞，而是兵士羣衆的勇敢，勞苦民衆熱烈的擁護。而且正因為國民黨軍閥還霸占着軍隊的指揮權，所以這些『勝仗』都還是半吊子的勝仗。真正的勝仗一定要能夠完全打退日本軍隊，一定要叫日本軍隊完全退出租界，退出一切中國的領土。而且要完全取消日本帝國

主義在中國的一切特權，一切不平等條約……。現在的國民黨怎麼樣呢？汪精衛蔣介石說：一面交涉起來，只要日本軍隊不再開炮，只要日本軍隊退至相當安全地帶，中國軍隊也可以退十華里，就可以休戰」。蔡廷楷等也說：「只要日本罷兵，中國就可以不抵抗」！

因此，中國的革命的民族戰爭要能夠勝利，就必須：

①上海的一切兵士立刻不顧國民黨長官的命令，追打日本軍隊，一直要打到租界裏去，消滅日本帝國主義的根據地；兵士羣衆要一致起來反對退却，反對停戰，反對「中立區」，反對把上海交給任何帝國主義。

②一切民衆都要一致起來反對國民黨的壓迫，自動啓發革命的團體，大批的武裝工人和一切勞苦羣衆，組織民衆義勇軍和游擊隊，和兵士羣衆共同去打日本軍隊，并且保護自己的團體。

③革命的兵士立刻組織起每一營每一連每一戰壕的兵士委員會，審查長官的命令，監視陰謀破壞進攻計劃的長官，并且逮捕他們，自己直接接受民衆的捐款和慰勞品，自己直接來分配這些捐款和物品，並且加入民衆的革命團體。

④民衆義勇軍——武裝的工人農民店員……和革命的兵士委員會，立刻共同組織革命軍事委員會，來領導這個革命的民族戰爭。

⑤革命軍事委員會立刻沒收一切日本帝國主義的銀行，工廠，商店和交通工具，拿來供給革命的民族戰爭的應用。并且用同樣的辦法對付幫助日本帝國主義的其他帝國主義。

⑥革命軍事委員會立刻騰出一切公共房屋給失業工人和難民災民居住；沒收一切日本帝國主義的房產交給工人和災民的團體；革命軍事委員會要大批的徵發大資本家商人的糧食衣被分配給失業工人和難民災民，要沒收一切帝國主義走狗和投機的資本家的財產；革命軍事委員會立刻宣佈八小時工作制和社會的勞動保險，改良失業工人的生活，革命軍事委員會宣佈沒收一切地主的土地，分配給貧苦的農民羣衆。

——革命軍事委員會，用臨時政權的資格，召集工農兵以及一切勞動民衆的代表會議——奪地主資本家的參政權；這個工農兵勞動民衆的代表會議就是正式的政府，革命軍事委員會就把政權移交給他。

這樣，不但在上海，而且在全國行動起來，然後才能夠打勝日本帝國主義，以至於驅逐一切帝國主義的勢力，因為這樣方才有真正的決心推翻帝國主義的勞動民衆自己的政權來領導這個革命的民族戰爭。

這樣，革命的民族戰爭之中，才能夠從革命的兵士委員會，從勞動民衆的義勇軍，產生出強有力的工農紅軍出來，他們和現在內地各省的紅軍，將要共同組織真正打勝日

本帝國主義的中心力量。他們像蘇聯一九一八——二〇年的時候一樣，不但能夠打勝日本，並且能夠打勝六七國之甚至於十四國帝國主義的聯軍。中國的解放完全要靠民衆和兵士自己的組織和鬥爭，完全要靠勞動羣衆自己的武裝力量——紅軍。

因此，革命的民族戰爭要打勝，就必須推翻國民黨的地主資產階級的軍閥和政府。假使沒有國民黨的壓迫和屠殺，江西湖北的紅軍早就可以在武漢，在上海來打日本帝國主義了，安徽山西陝西的紅軍，早就可以打到滿洲去驅逐日本軍隊了。假使沒有國民黨的壓迫和屠殺，上海的工人和兵士，青島，天津，汕頭……的工人民衆和兵士，滿洲的工人民衆和兵士，早就可以組織義勇軍和紅軍，去打掉日本帝國主義了。而國民黨現在正在更加出力的替日本和列強帝國主義『剿伐』紅軍，屠殺民衆……，而且還假裝着『抵抗』，來欺騙民衆和兵士，霸占住軍隊的指揮權，以便他們製造一個失敗的局面，好借日本和列強的槍砲更加屠殺一般中國民衆和兵士，使他們可以安安穩穩的把中國雙手奉送給列強和日本瓜分！

革命的民族戰爭要勝利，就只有推翻國民黨的統治！

三月一日

規定口號的藝術

華 明

口號是甚麼？口號就是某種隱含或目的之簡明的語言。

一切羣衆鬥爭之中，尤其是政治鬥爭，口號占着極重要的地位。「戰爭或個別作戰之時，如果能很正確的標明戰爭的目的，便在軍隊之中，這種標語人人都知道——那末，往往僅只這一標明戰爭目的的命令足以決定這次戰爭的成敗，因為這種命令是振作兵士的精神，統率全軍戰士等的方法。政治鬥爭之中，口號的作用尤其大，因為政治關及於幾萬萬幾千萬各有各的要求和需要的人民」（斯達林）。既然如此，可見一種口號的提出與規定，對於羣衆鬥爭的勝敗，顯然是極大的關鍵。口號一有錯誤或不及時轉變，往往會使羣衆失去鬥爭目標或混淆鬥爭的內容，使鬥爭發生危險，或竟因此成爲致命之傷。因此，規定口號的藝術，實可說是我們領導羣衆藝術之主要前提。最近我們在宣傳鼓動工作的檢閱中，發見我們在這一方面實有不少的缺陷，根據我們最近的一些實際經驗，對於規定口號的問題，加以必要的研究，綜合出重要的教訓以教育我們自己及羣衆，這對於轉變我們的宣傳鼓動工作，加強我們對於羣衆鬥爭的領導，一定有很重要的幫助。底下我們即按照問題的主旨脈絡，分爲幾個要點來說明：

第一、口號對於羣衆鬥爭既然有如此重大的作用，所以我們要定出口號來，必定要很謹慎的研究總的形勢，很明確的估計當時的職任及目的，否則，如果祇憑我們主觀的想像或根據一些不盡不實之報告，便冒冒失失來規定各種口號，結果往往鬧成笑話，猶其餘事，有時甚至因此造成種種惡果，不但不能動員羣衆，而且脫離羣衆，斷送羣衆鬥

爭。對此最明顯最殘酷之教訓，莫如四川黨部對於反日運動之錯誤領導。他們最初對於反日運動是採取「左」傾關門政策，甚至武斷地說「反日運動是落後羣衆意識之表現」。因此對於民衆自發的各種反日鬥爭，完全旁觀漠視。當雙十節成都舉行雖遠在國民黨控制御用之下而確有羣衆參加的反日市民大會時，我們四川黨部却決定同時同地另外舉行所謂反帝飛行集會與之對抗，而不積極動員廣大羣衆去參加反日市民大會，去轉變反日市民大會到我們領導之下來。結果自己的飛行集會流產，而派去參加市民大會的少數幾個同志，因為只在大會上單純地高喊一些打倒一切帝國主義，蘇維埃萬歲的根本政治口號，反被他們當作「亡國奴」趕出來，這是標本式的以「左」傾關門主義掩蓋着對反日運動的機會主義的消極！後來四川黨部覺察到自己這種消極態度的錯誤，但是一轉却又轉到極右。而且反革命的去號召「援馬反日」運動，把我們自己的革命主張完全放棄，這種可悲的事實居然在共產黨中發見，不能不使我們嚴重警惕的了！又如不久以前，上海滬西申新第一紗廠的一次工人鬥爭中，在開始決定鬥爭口號時，區委同志中竟有人提出二十二條要求，結果被工人一致反對，於是這位「同志」一時「心血來潮」，立刻改變策略，主張先只提三個口號（在工廠中組織反日會，要求廠方發給辦公費及反日會職員請假不扣工資）去「試試」工人，看工人是否跟着我們走，結果因為沒有抓住工人切身要求去發動羣衆，自然無從取得勝利，這種希奇古怪的所謂口號「試試」論，很

明顯的也是根本不了解從「謹慎的研究客觀形勢，明確的估計當時的職任及目的」來正確規定口號的重大意義。從上而所舉兩個可悲的事實中，可以給予我們許多重大的教訓，我們應該堅決克服這種錯誤，細心的去體會羣衆的迫切要求，去感覺「國內全部政治生命脈搏的跳動，尤其是廣大無產階級的運動與情緒」（列寧），從這種體會上與感覺上提出能夠動員羣衆的要求與口號。

第二、我們的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因此，我們提出與規定各種口號，不僅要謹慎的研究客觀形勢，而且處處要從無產階級的觀點出發。無論在何種條件之下，我們共產黨都應該保持自己工人階級先鋒的獨立的政治面目，就和那最急進的小資產階級的政治面目也須劃分清楚，當我們審定口號的時候，無論這個口號關及全國或部分羣衆，我們都必須嚴格的檢別它的階級性，切不可再像阿喬同志那樣，居然把資產階級的「抵制日貨」的口號看爲我們共產黨的基本口號。又如過去在江蘇省委宣傳部做工作的張高生夏之西同志，竟在省委宣傳品上提出「反對蔣介石包辦國民會議」，「反對鞏固一黨專政的約法」，「反對南京政府的賣國外交」等口號，與最近上反同志提出「反對國民黨設立政治分會」的口號，很明顯都是離開無產階級觀點的口號，結果都必然要做改組派第三黨取消派等資產階級的俘虜。此外，前面所舉四川黨部在反日運動中提出「援馬反日」的實例與最近上海民反報紙把我們的「召集工農兵及一切革命民衆代表會議」的口

號修改成爲『召集工農商學兵代表會議』的口號，也無疑的是根本錯誤的。

第三、具體的口號必須在具體的環境中提出來，而不應死死守着一些空洞的原則。例如去年『九一八』滿洲事變發生時，滿洲省委就犯了這樣的錯誤，滿洲是滿洲事變的發生地，而滿洲省委的決議和宣言中竟沒有一個反日的單獨口號，以指示出羣衆憤激反日的出路。他們僅僅提了這樣兩個口號：一個是『反對帝國主義佔據滿洲』（決議案與宣言都如此寫，不能是筆誤），另一個是『驅逐日本與一切帝國主義的海陸軍』，前一個簡直將有實際內容的『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佔據滿洲』的口號抽象化了，後一個在滿洲也不比『驅逐日本帝國主義海陸空軍出境』更容易動員羣衆。我們在反日運動中固然不容許對其他帝國主義發生幻想，或忽略了反對其他帝國主義，但滿洲事件的中心，總應以反日爲第一位，那有因恐懼羣衆忽略其他帝國主義，就連一個反日的單獨口號都沒有道理！這一經驗特別是在工廠，兵營，農村，與學校中決定具體的鬥爭綱領時，應當嚴重注意，當我們提出與規定這種具體鬥爭口號時，必須切實細心考察，體會並抓緊自己環境的具體條件，只有依據這種具體條件才能提出能夠動員羣衆的要求和口號，去爭取鬥爭的勝利，要極力避免現在有些地方黨部提些空空洞洞到處通用的口號來空談鬭爭的毛病。

第四、口號不但應當明顯，應當是指示職任集中的整個兒的標語，而且應當要在

適當的時機發出。不可過早，過早了羣衆不能接受或驚疑甚至將羣衆嚇退（左派幼稚病）。不可過遲，過遲則時機一過羣衆的氣勢即不免低落潰散或羣衆自動亂幹每易遭失敗（尾巴主義）。例如現在上海反日鬥爭中，我們有些同志不願意執行堅苦的宣傳羣衆，組織羣衆，武裝羣衆的工作，而立刻提出『準備上海第四次暴動』與『建立無產階級的政權』（前一個口號在滬西區委有同志這樣主張，後一個口號是在江蘇省委二月三日所發宣言上發見的）的口號作爲黨行動口號，就很明顯犯了過早的錯誤。但如果當此日本帝國主義橫暴佔領上海，野蠻屠殺中國民衆，國民黨投降帝國主義，出賣民族利益更加無恥露骨，國民黨與帝國主義協同壓迫革命更加殘暴，民衆反日反帝反國民黨情緒十分高漲之時，我們還不勇敢及時提出『民衆自動武裝起來驅逐日本帝國主義』，『革命兵士與民衆聯合起來打倒帝國主義與國民黨』等中心口號去動員羣衆，則無疑的就要成爲廣大羣衆之尾巴。斯達林同志在一篇著名的論文『因勝利衝昏了頭腦』中曾說：『領導的藝術，這是一件最重的事情，不能落在運動的後面，因爲落後就成爲尾巴，但也不能跑前，因爲跑前，就要脫離羣衆。誰要領導運動而同時又要同千百萬羣衆保持聯系，那他就應該做兩條戰線的鬥爭，反對落後的與反對跑前的』這在口號的藝術上，也就應當反對過早或過遲，而銳敏的抓住適當的時機發出，因爲只有這樣才能領導羣衆而同時又和千百萬羣衆保持聯系。

第五、口號的性質有宣傳的口號，吹動的口號，行動的口號，最後就變成指令。如果黨所定出來的口號，是關及整個時代的，換言之，這種口號是為實現戰術職任的，那麼，這種口號便帶着宣傳口號的性質，例如現在時期我黨所提『土地國有』『八小時工作制』『推翻帝國主義與國民黨統治』『建立全國蘇維埃政權』『反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武裝擁護蘇聯』等口號，都是這種性質。到了實現這些口號的時機已經成熟，征取廣大的羣衆到這些口號之下並組織他們預備去實現這些口號時，那末，這些口號就變成鼓動口號的性質。再進到運用實力，推動羣衆直接行動實現上述職任時，於這些口號也就進到『行動口號』的性質。最後調集羣衆，分配職務，配布各種力量，直接動員於某月某日某部分人某幹某幾件事，實際並且具體執行上述任務時，這些口號，就變成當時的實際指令了！有很多人不懂得這種口號性質的區別，所以往往將各種口號相混，或者將口號與指令相混，所以常常發生強迫羣衆鬥爭與落後，做尾巴的現象。再則，口號的作用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它可以隨着鬥爭的發展，從這一口號轉變到那個口號。有時，往往某一個口號在昨天還是正確，而到今天因為政治環境與歷史條件已經變更，而『突然』失去其意義，這樣的事實在歷史上也屢見不鮮的，例如在俄國二月革命之後『一切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請參看中央『十月革命十四週年紀念提綱』）。

在鬥爭的過程之中，有的時候還會造成這樣的形勢，即：『逼得黨非在二十四小時